

那些年， 我们一起走过

田可文与他音乐学的学生们

(下卷)

田可文 等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那些年， 我们一起走过

田可文与他音乐学的学生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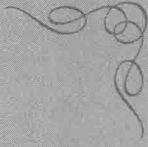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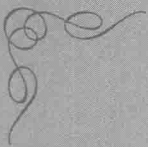
(下卷)

田可文 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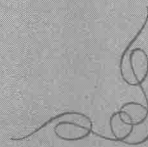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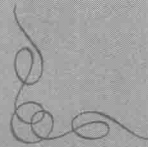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美育思想在 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展

夏滢洲

摘要：在中国近代新文化初创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传承古今、融通中西，基于“改造国民性”萌生美育教育思想，于辛亥革命这一时间节点，在观念上先后经历了从功利主义到超功利主义的转变，在实践中则历经“救国”向“救人”的转变。这显示出梁启超在中国艺术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基与推进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今天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梁启超；美育；改造国民性

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王国维最早从西方引进了“美育”这一概念。1903年8月，他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他在吸收西方近代心理学关于知、情、意三分的学术成果基础上，为追求真、善、美的“完全之人物”的塑造，提出智育、德育、美育是教育的重要方面。而且，美育之内涵必然有“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①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于1月3日举行召开“临时教育会议”，提出民国教育要根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

^①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1903年8月第56号；转引自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世界观、美育五项”。^① 第一个将“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视之为“今日教育不可偏废者也”。事实上，对中国近代美育思想的起源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并不晚于王国维与蔡元培，而且也不乏自身的识见。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代表资产阶级要求进行改良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进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将要走的道路。于是，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他的积极拥护者梁启超、谭嗣同等进一步发扬了维新派启发民智的思想，强调了教育的独特作用。从康有为给光绪帝的上书《上清帝第二书》、《请开学校折》中，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学校应设音乐课程的开端显露，到梁启超敏锐洞悉到“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意义而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②，其间蕴含的意识无疑早在王国维、蔡元培之前。

戊戌变法的失败，唤醒了亡命日本的梁启超致力于“开民智”、从事学术研究、传播先进学术思想的工作。研读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7年间在日本横滨自办的《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饮冰室诗话》等论乐文章，不难看出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变化。他把“智慧”、“学术”的价值置于“权术”、“政策”之上，将康有为原本只是设立包括“歌乐”在内、用于学堂作为“创国民学”的政策主张，提升到了具有美育意识的可操作性层面，树立起了近代意义的学堂乐歌的内涵。梁启超观察到诸多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势的了解，以及日本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成功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的经验，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论述，为国内学堂乐歌的发展作了潜在的准备。

20世纪初期，在日本居留的梁启超一方面接受并宣传穆勒、斯宾塞等欧美及日本思想家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创办的报刊，如《新民丛报》、《清议报》等，发表文章，论述教育的目的与实施，主张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来铸造中国的国民性，

①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杂志》第八卷第10号；转引自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8页。

他悄然发起的国民性问题讨论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响应，掀起了国人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第一次高潮。190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改造国民性的认知和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确实，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必须要改造国民性，使其具备现代国民的素质。面对戊戌变法失败带给中国社会、百姓的压力和刺激，梁启超在集合严复1895年在《原强》中提出的三民思想和“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在《新民说》中，对民智、民力、民德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提出了以塑造民德为主的国民形象建构。在对民德的塑造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最缺少的就是公德，并且指出“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①将公德加以强调，并同社群和国家的存亡置于一道，认为私德受到集体主义制约，是公德基础上的私德。同时，中国国民在现代化转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知识体系，同时还要看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对于改善民智方面的重要性。作为中国国民，应该重视其独立性和自身价值，所谓“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②在近代学堂乐歌勃兴的过程中，曾志忞显然受到梁启超“改造国民性”观念的影响，与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萌生相一致。在他的《〈乐典教科书〉自序》中，曾志忞认为：“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③为此，曾志忞专门做了一个图表来解释其思想。图表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音乐之关于学校者和音乐之关于社会者。音乐之关于学校者包括了发音之正确，涵养之习练，思想之优美和团体之一致，这是就唱歌的教授而言的。对于音乐之关于社会者，曾志忞从德育、智育和体育三类着手，先将德

①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

② 同上，第655页。

③ 曾志忞：《〈乐典教科书〉自序》，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育分为忠孝、公德和自治、独立，智育包括普通知识和农、工、商、实业，体育则有尚武精神和敏捷举动，以上是就唱歌之普及、乐器之感人而言的。曾志恣的这一区隔，即音乐基于德育、智育和体育关于社会的改良，无异于梁启超“改造国民性”观念中提出的对民德、民智、民力的改造。具体而言，在德育部分，公德是民德改造最为强调的，忠孝、自治和独立则是“改造国民性”观念中以西方近代国民为标准所提出的改造要求；在智育部分，普通知识和农、工、商、实业都是在民智改造中需要向近代西方学习的，尤其是实业这一中国社会所没有的事物，对它的学习和改造极具近代意义；在体育部分，虽然和民力的说法不一，但是两者对尚武精神和强健体魄的追求是一致的，敏捷动作只是强健体魄的具体表现。此一观点，与十三年后蔡元培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证之提出的五项国民教育宗旨可谓同出一源，这一点尤其对于一位致力于学堂乐歌的社会普通人士而言，在实践和着力的学校音乐改良时，相信音乐对社会的改良于一般人民性质的效果更大，更有利于国家。所以曾志恣急迫地感叹道：“社会腐败以音乐感动之，当今急务也。”^①更何況在梁启超那里，他不仅在《新民说》中提到“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②，还专门著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为自己“改造国民性”观念找到传统文化的依据，且加重了其改造的砝码和说服力，另一方面使其采用教育的手段来“改造国民性”的想法提供其理论支撑，因为他认为孔子是中国提倡人格教育最多的人。这一出发点同时也是蔡元培在1912年《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论述设立民国教育要合于共和民国的宗旨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批判忠君尊孔的读经教育之上。

虽然没有开宗明义地提出“美育”一词，但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萌生却是由来已久，至少在王国维之前便已有萌芽。但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对美育

① 曾志恣：《〈乐典教科书〉自序》，张静蔚编：《搜索历史》，第48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769页。

思想的观念或理解有很大不同，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在王国维那里，美育作为培养完美人格而不可或缺，其实施虽然有多种途径可以完成，但音乐艺术以其独立的实体、较强的感染力，能够调和人之感情，在于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教育作用。^①然而，在梁启超那里，由于音乐的精神作用和改造国民性相关联，所以他强调教育作为改造手段的重要性，是“培养现代国民”，一种出于某种功利性或功利主义的教育而审美教育，即所谓教育的作用是“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②“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③在学堂乐歌兴起的初始阶段，梁启超对改造国民性思想中音乐社会功能的表述，借助于现代媒介的宣传和西式教育形式的普及，催生了乐歌创作、音乐理论的发展与运用，初步奠定了学堂乐歌的表现内容与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大家对共和国的诞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在这一时期的学堂乐歌中，出现了一批以歌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为内容的乐歌，如沈心工的《革命军》、华航琛的《光复纪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华航琛在1912年出版的学堂乐歌歌集就是以“共和国民”为名，在歌集的“编辑缘起”中，他提到，“国民新造教育方针与昔迥殊，亟宜编为歌曲以端趣响。……歌调虽仍其旧，而歌词务求其新，且词句浅显，俾髫龄儿童一矢口而便生共和之观念，振尚武之精神”。^④从这个“编辑缘起”就可以看出，这个歌集的出版是为了迎合共和国新的教育方针，对歌词的编写是以使儿童能够具有共和的观念和尚武的精神为主旨。该歌集的编辑在编创上承袭了学堂乐歌一贯的“选曲填词”、“按词选曲”的方式，在题材内容上则以表现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心；在思想上延续了以音乐

① 王国维：《教育世界》1907年10月第148号，转引自张静蔚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911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77页。

④ 华航琛：《〈共和国民唱歌集〉编辑缘起》，载张静蔚编：《搜索历史》，第26页。

改造国民性的主旨，尤其是对小学生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视。

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的内涵，让辛亥革命这一称谓走入寻常百姓。与民初相比，梁启超的美育思想观点有了渐变，就像他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一文中，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作概略的统计一样：“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此外像制丝咧，制面粉咧，制烟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①国民经济的改观为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嬗变埋下契机，使其得以有较为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和反思中国近代文化的问题。

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后撰写了《美术与生活》（1922）、《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和《学问之趣味》（1922）等。这些文章反映了梁启超对美或美育的体认和感悟，他希冀建立起一种趣味教育思想来进行审美实践，与前期的功利主义美育思想相比而显得超功利，差异明显。首先，他指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②接着在《美术与科学》中，梁启超提及美育，“希望中国将来有‘科学化美术’，有‘美术化的科学’”^③，这样的教育，其目的“总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人最优良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④同时，梁启超还明确地指出自己的人生观（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后）是“拿趣味做根柢”的。^⑤他指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我们主张

①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3381页。

②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3922页。

③ 梁启超：《美术与科学》，《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3962页。

④ 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3962页。

⑤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3963页。

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者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①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提出趣味教育的想法，根本目标在于通过美育教育来使人成为有趣味的人，其实质指向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之上。这是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梁启超所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此前戊戌维新时代，他以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本着培养政治人才，转变为辛亥革命时期以超功利主义思想培养现代国民的目的，说明了梁启超美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发展而言，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着眼于趣味—情感的教育，从事教育者本身的职业具有二重趣味。而其所面对的对象，也已经由先前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转向了更为广泛、更为普通的近代国民教育。

流质异变，梁启超的美育思想在变化之中保持着不变的因子，即其围绕中国现代国民性改造问题实施的教育，对于今天仍不乏其现实意义。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在延续梁启超“新民说”中对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强调之外，提出了“美育”的观点，认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行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感情发动而成，“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② 蔡元培对“美育”的定义和作用，更多的是注重对国民情操的陶冶和精神境界的提高，是对国民自身价值的强调和重视。与蔡元培不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对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和趣味教育、情感教育的启蒙思想，不仅开拓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内涵，促进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普及。正是在梁启超与蔡元培二人美育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辛亥革命之后，学堂乐歌的勃兴抑或现代音乐教育与创作发展呈现出的迅猛之势，一直伴随着国民性改造的观念。作曲家中，黎锦晖无疑是践履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譬如他对儿童音乐的看法，认为其不仅应该具有培养儿

①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五卷），第 3963—3964 页。

② 蔡元培：《美育与人生》，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蔡元培美学文选》，第 220 页。

童的学校音乐教育作用，更应该具有涵养民众的社会音乐教育作用，在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论调上，黎锦晖指出：“儿童的模的本能，十分发达。每家的儿童，没有不爱表演成人生活或动物情态等形状动作的，有人导演一种深有趣味，富于情感，而且含艺术意味的歌剧，他们当然要十分的惊喜而踊跃从事，于是藉此可以训练儿童们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可以养成儿童们守秩序与尊重艺术的好习惯。”^① 其思想与梁启超如出一辙，且在价值取向上也颇为相同，即他们都把着眼点放在每一个国民上身，放在提高国民素质之上，让美育成为一般民众的国民性改造的最好手段。

一个世纪前，值辛亥革命爆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本着改造国民性观念，成为世纪初的主潮，开启了世纪思想启蒙的先河。其间萌生的梁启超美育思想及其后的延展，虽然先后经历了从“救国”向“救人”的转变，但总体上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研究视域的拓展、对古今文化的交替传承与中西文化的革新创造，典型地体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轨迹与个性特征。

田说：夏滢洲（1972—），男，文学博士。1989年至1993年随我在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获学士学位，后在西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现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协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音协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受聘担任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出版有《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中国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

^① 黎锦晖：《麻雀与小孩》“卷头语”，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2月。

版社2004年版，2005年获“陕西省艺术科学研究专著类二等奖”）等专著。主持有陕西省教育厅资助立项“先秦音乐思想研究”（负责人）、陕西省教育厅基地项目“陕西音乐社会史·汉代部分”（12JZ040，负责人）、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西安市地铁空间音乐环境的优化措施研究”（2011KRM100，负责人）、教育部音乐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之西安鼓乐研究”（12JJD760001，负责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古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形成与中古伎乐的转型”（11BD041，负责人）等科研项目。

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历程

余文博

摘要：“新音乐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主要是对“新音乐运动”这一特定历史名词发展历程的探索与研究，因此是建立在对文献研究为主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本文的主要论点是“新音乐运动”自运动之初，至结束，经历了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院校师生的音乐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30年代的抗日歌咏运动、40年代国统区以及解放区音乐活动这几个方面。“新音乐运动”具有多样的形式与广泛的内容，在爱国民主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鼓动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新音乐运动；黄自；左翼音乐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秧歌剧

一 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院校师生的音乐活动

“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中华同胞，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也召唤着专业音乐家投身到民族救亡战斗的行列中去，“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立音专师生在萧友梅、黄自的鼓励支持下，组织了“抗日会”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活动，黄自还率学生到青浦一带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演出，1933年底，音专师生利用春假去杭州举行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黄自任主席，还亲自担任报幕。1936年，发起组织上海管弦乐团，呼吁同胞们快快觉醒，

团结抗日。^①

专业音乐院校的爱国师生们都纷纷以笔作伐，创作抗战爱国歌曲，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这一群体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黄自，其他有陈洪、应尚能、老志诚、周淑安、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张肖虎、青主等。黄自自己作词作曲的气势磅礴的《抗敌歌》^②，抒发了“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的豪迈气节。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他还为何香凝的《赠前敌将士》谱曲；为韦瀚章的歌词《旗正飘飘》谱曲。这两部作品当时均由胜利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另外加上《军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国庆献词》共五首歌，合编为《爱国合唱歌曲集》，1934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萧友梅也先后谱写了《义勇军》、《从军歌》；国立音专的“抗日会”宣传股干事刘宴如（刘雪庵）收集了国立音乐师生所作的爱国歌曲，并于1932年在重庆编辑出版了《前线去——爱国歌曲集》；当时如陈洪的《冲锋号》、《上前线》，应尚能的《吊吴淞》，周淑安的《同胞们》、《抗日歌》，陈田鹤的《八一三战歌》，老志诚的《民族战歌》，何安东的《奋起救国》等，都在30年代初的爱国救亡活动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

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院校师生的音乐活动，是没有组织领导，没有指导理论的，属于自发行为，是个人的爱国举动。根据本文第一章第二节中“新音乐运动”的界定，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院校师生的音乐活动并不属于这一范畴，但它渲染了抗日气氛，制造了抗日舆论，给当时部分进步音乐家以抗日活动的启示，为广大群众输送了抗日理念，激发了他们的抗日激情，为“新音乐运动”提供了活动素材，创作了良好的环境。

^① 黄德音、黄惠音、黄祖庾：《深深的怀念——写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人民音乐》2005年第2期；钱仁康：《黄自的生活与创作》，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

^② “韦瀚章词，创作于1931年，同年11月9日，《抗敌歌》由音专学生在广播电台首次播唱，并由胜利公司灌成唱片。”卞祖善：《缅怀一代宗师——黄自一百周年诞辰纪念》，《视听技术》2004年第11期。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运动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白区文化界组织的联络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其后成立了“剧联”等八个左翼文化联合组织，并不久就扩大到了北平、武汉等地。^①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便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目标，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对于音乐问题，在“左联”1930年的《大众文艺》中，曾先后发表文章和译著，一方面呼吁“造就更大众的，更有理论支持的新兴的音乐”；一方面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音乐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1932年，谢韵心（即章涅）和郑导乐（沙梅）编辑的《戏剧与音乐》^②创刊号，发表《音乐短论》等文章，阐述了“音乐是社会意识形态，……作家主观的情感……被时代、社会决定着”的观点；周起应（周扬）在他所译的《苏联的音乐》^③译后记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已为左翼音乐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左翼文学、戏剧、电影等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音乐的配合，于是1933年初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④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虹口区多伦路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定鲁迅、沈瑞先、钱杏树三人为主席团，鲁迅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选出“左联”的常设机构，决定了理论、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左联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

② 谢韵心、郑导乐：《戏剧与音乐》，上海：上海艺术书店，1932年。

③ [美] J. 弗莱曼著，周起应译：《苏联的音乐》，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32年。

④ 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由宋庆龄、田汉等人士发起，1933年初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下属有经济、教育、戏剧、音乐等小组，致力于宣传介绍当时的苏联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见《文艺报》1960年第20期刊登的田汉在影片《聂耳》座谈会上的发言。

和“新兴音乐研究会”^①等左翼音乐组织；1934春，在田汉的领导下，张曙、任光、聂耳、安娥、孙师毅、吕骥、王为一、陈梦庚等人在上海的左翼剧联内建立了一个音乐小组^②；分别担任百代公司音乐部正、副主任的任光、聂耳组织百代国乐队^③。冼星海1935年秋天从法国回来后，很快也投入左翼音乐活动的行列。^④1934年10月，任光、聂耳以百代公司名义主持举办“百代新声会”，播放了许多新录制的进步歌曲唱片，获得到会的听众和新闻媒体记者的好评。^⑤1934年底，聂耳组织了联华生乐团、电通歌咏队。^⑥1935年4月，聂耳出国后，吕骥、沙梅在其基础上于5月组建了“业余合唱团”^⑦，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深入到工人、学生、市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歌咏，在群众中建立了根基，从而使左翼音乐运动的实际影响不断得到扩大。上海基督教青

① 简称“音乐研究会”，为创作中国的新兴音乐，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道路，1933年春成立于上海。成员有聂耳、任光、安娥、张曙等。他们经常集体讨论创作的群众歌曲。聂耳第一首工人歌曲《开矿歌》与张曙早期一些群众歌曲，都是在这个研究会的推动下产生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

② 全称“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春成立于上海。领导者田汉，成员有肖之亮、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孙师毅、吕骥、王为一、陈梦庚等。小组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开展革命音乐活动，通过在工人中间的活动（如到女工夜校教唱歌），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思想感情和对音乐的要求，并为进步电影和戏剧作曲，利用电影和戏剧插曲传播进步思想。曾为影片《渔光曲》、《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逃亡》、《风云儿女》、《自由神》，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话剧《回春之曲》等配乐，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批优秀的革命歌曲。1935年组织了业余合唱团，推进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后，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音乐小组随着左翼剧联的解散而停止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

③ 见聂耳1934年4月4日的日记及注释，《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聂耳全集》，1985年。

④ “1935年，我由法回沪，并很快与上海左翼文化界建立联系，在田汉等左翼文化界朋友的帮助下，入百代唱片公司及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音乐创作与电影配乐工作。”《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冼星海全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⑤ 见聂耳1934年4月4日的日记及注释，《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1985年。

⑥ 见聂耳1935年1月的日记及注释，《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1985年。

⑦ 业余歌咏团又名业余合唱团，由吕骥、沙梅等组织并主持，参加者均为上海左翼影剧、音乐届人士，不久，又吸收了许多中、小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以及进步职业青年。除经常举行集体歌唱和演出外，其中一部分人还分头到工人、学生、市民中教唱救亡歌曲，每人分别领导一至数个群众歌咏团体，对上海的群众歌咏运动起了指导作用。当时演唱的歌曲除国内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外，还介绍了国外的革命歌曲。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

年会的学生干事刘良模 1935 年 2 月成立民众歌咏会^①，开展了多个歌咏运动，如 1935 年 10 月 9 日晚，“中华第一补习学校校友会为预祝第二十五周年国庆纪念，特假座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联欢会，各团体个人表演唱歌音乐戏剧等游艺，最后则殿以化装救亡歌曲。当《义勇军进行曲》歌唱时，台上台下完全达成一片，五百余条喉咙同时迸出抗敌救亡的歌声，主席宣布散会时，会众唱高歌《打回老家去》恋恋不肯散去”。^②后成立蚂蚁剧社歌咏团^③、新声歌咏团等歌咏组织。

左翼音乐家们最初的活动主要是为左翼影剧的演出写作歌曲和编配音乐，其后创作范围不断扩大，写出了一大批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反抗要求以及号召抗日救亡的歌曲，并进行了电影音乐创作的探索。如任光为电影《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等创作同名主题歌及插曲；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逃亡》、《凯歌》、《风云儿女》写作了《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塞外村女》、《打长江》、《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主题歌与插曲，为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创作了《码头工人》、《前进歌》和《告别南洋》、《梅娘曲》等歌曲；吕骥为影片《自由神》写作了主题歌，为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写作了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张曙为话剧《洪水》写作了《筑堤歌》并创作了《农夫苦》等歌曲……

左翼音乐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聂耳的音乐创作。他创作中成就最高者，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内容的群众性歌曲，如《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此外，他还第一次以鲜明的音乐语言和富于独创性的

① 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起，并得到左翼音乐工作者的支持，参加者以上海的爱国青年为主，初有 90 余人，后增至 300 多人；它明确宣告“为民族解放而唱歌”，以集体歌唱、歌咏大会、歌咏比赛、广播演唱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影响日益扩大，至 1936 年中，会员已增至 1 000 多人，并在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分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

② 《救亡情报》，1935 年 10 月 18 日。

③ 同上，1936 年 6 月 21 日。